

「佔領中環」破壞與中央互信

□鍾秉敬

港事港心

香港能否落實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選的目標，歸根結底，是香港社會能否凝聚共識的問題。說得再明白一點，就是立法會各黨派能否相互妥協消除分歧。

但令人奇怪的是，反對派人不提自身責任，卻將責任全推到中央政府身上，不斷指責是「中央不信任香港」、「阻礙香港普選」。更有甚者，某些以法律學者掛帥的政治人物，以「達到平等對話」為由，鼓動所謂的「佔領中環」運動，意圖製造民意壓力以逼中央就範。如果反對派還相信，香港市民所堅守的核心價值，就應該做出進進香港與中央互信的行動，而不是做出「少數人之惡」的偽民主之舉。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中央絕非反對或者禁止香港擁有普選的權力，事實上，基本法已清楚寫明「最終達至普選」。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前所作出的決定，更已明確指出，香港可於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

官，決定亦同時清楚表明，在行政長官普選後，立法會全部議員亦可以由普選產生。

編造民意 反對派不光彩

因此，從憲政角度上，香港已不存在任何落實普選的阻力。問題也早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後由中央降到了香港特區。中央政府並沒有義務，也沒有任何必要的責任，要強迫香港必須在二零一七年進行普選。事實上，按政改「五部曲」，政改方案由特區政府提出，交由立法會通過，最後才報中央政府批准，就算中央政府希望方案通過，若立法會拒絕，普選同樣會夭折。如果真出現此種情況，是否也要歸咎於中央政府？

當然，反對派人士或許會說，香港的建制派「聽命」於中央，只要中央首肯，建制派一定不會在立法會投反對票。這種說法是典型的英國殖民政治者思維。假若此種邏輯成立的話，那麼是否同樣可以說，反對派完全聽命於英美政治勢力，如果美國人反對，反對派就只能反對到底？反對派以這種邏

輯來攻擊中央政府、攻擊香港的建制派，實際上是在揭露自己的思維缺陷。若一項得到全港三分之二市民支持的重大議題，建制派敢反對嗎？這不是與民為敵的做法？有哪個愚蠢的政治人物會做出這種舉動？事實上建制派所代表的，是香港一大部分市民的意見，攻擊建制派「聽命」於中央，無異於抹殺真正的民意。

維護互信 各派責無旁貸

民主從來不是一步到位的，就算是反對派的精神「教父」美國，落實全民普選，也用了超過兩百年時間。香港一百五十七年的殖民統治，更是到最後五年，才有真正意義的議會選舉。當然，時間短長，不應成為落實普選的障礙。但同樣，時間短長也不應成為強行抹殺其他民意的藉口。一些學者如葉健文、戴耀庭常掛在嘴邊的是：「討論普選二十年，自己等不及了」，於是通過自己的十多年的學者面目所經營到的剩餘政治價值，鼓動一場所謂的「佔領中環」運動，意圖將自己的個人意願，強

加於香港市民身上，人為地製造虛假民意去逼中央就範。

這種做法其實非常可笑，假若香港廣大市民真的像反對派口中所言，如此強烈且一致地站在他們一邊，焉用戴耀庭先生人為地去呼籲、鼓動「佔領中環」？不是說香港市民已經足夠成熟了嗎？難道還需要葉健文先生去「開啟民智」、訴說民主的好處？這種做法的本身，根本是在侮辱香港七百萬市民的智慧。更是那種典型的殖民精英思維在作祟，將香港市民視作「待牧的羔羊」。

戴、葉兩位學者，長期觀察香港的政改發展，過去處事方法一向以溫和理性著稱，此次竟然鼓吹激進的革命式民主，其背後原因耐人尋味。但如果這兩位學者還認同，香港的成功在於四大核心價值，在於求同存異、理性溝通的話，那麼他們更應該去督促進香港社會與中央政府的互信工作，而不是用極端手段去破壞這種來之不易、僅有的互信。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前日表示，要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統一起來；就是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就是要做到求「一國」之大同，存「兩制」之差異。這些話儘管不受反對派中聽，卻是香港的政治現實。

「自由行」絕非通脹主因

□吳明錄

近幾年訪港旅客中內地居民佔六至七成，旅客在港消費開支中，也有六至七成是來自內地旅客。但我們不能據此說內地旅客是推動本港物價上升的重大因素，因為所有旅客在港的消費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百分之十左右，而內地旅客在港消費開支只佔百分之七左右，並不會對本港的經濟活動尤其物價水平產生太大的直接影響。

指點香江



在剛過去的春節假期，大批內地旅客湧港，迫爆本港很多熱門旅遊景點及商場，不少港人感到擠迫和不便。這種情況在其他「黄金周」假期也時常出現。便是在非「黄金周」的日子，隨着內地開放「自由行」的城市越來越多，個別城市實施了「一簽多行」，來港觀光購物人數不斷上升，令本港本已十分有限的空間愈顯擠迫，市民大眾對此頗有微言甚至不滿。少數內地旅客不文明的失儀、失態言行，更是產生了較負面的影響。這不能不令人嚴肅考慮本港接待旅客的承受能力問題。

所謂「推高物價」太武斷

日前梁振英特首就「世通假期」問題作出回應時，就對本港未來的旅遊發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梁振英透露，政府內部已接近完成有關香港旅遊業日後發展方向的檢討，要點是，不應該盲目追求旅客人數的增長，而是應該追求更好的經濟效益，同時要爭取社會效益，「不能影響到香港市民的正常生活」。這無疑點出了內地「自由行」為本港旅遊業帶來機會與挑戰的核心問題所在，是值得關注與支持的，也再次表明梁振英政府是一心幹實事、急市民之所急的。如果這些檢討建議形成具體的政策措施，相信日後本港旅遊市場將會趨向於井然有序，在「質」的方面有較大改善。

大量內地居民來港「自由行」，除了給港人帶來空間上的擠迫和生活上不便，也有一些意見認為，是他們推動了本港的物價上升，甚或加劇了本港的通貨膨脹。說「自由行」遊客推高了本港的物價

，這當然是事實，因為他們來港觀光、購物、消費，為本港市場提供了更多的需求。需求增加了，物價自然會上升。但「自由行」究竟推動本港物價上升了多少，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學術問題。武斷地說「自由行」推動本港物價上升了很多，乃至是加劇本港通貨膨脹的主因，則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我們可以從幾個側面來簡單地回答這一問題。

遊客消費僅佔GDP一成

第一，本港旅遊業確實是依賴於內地旅客，近幾年訪港旅客中內地居民約佔六至七成，旅客在港的消費開支中也有約六至七成是來自內地旅客。但我們不能據此說內地旅客是推動本港物價上升的重大因素，因為所有旅客在港的消費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即GDP的百分之十左右，內地旅客在港的消費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左右，並不會對本港的經濟活動包括物價水平產生太大的直接影響。考慮到本地生產總值是個淨收入概念，而旅客在港的消費開支並不是一個淨收益指標，因此對本港經濟表現包括物價變動的直接影響就更為有限。

第二，在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構成中，近幾年佔比重最高的是進出口貿易，公共行政及社會和個人服務，金融及保險，及樓宇業權這四大領域，分別為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七、百分之十六，及百分之十左右，而這些都和內地旅客來港「自由行」並無太大的直接關係。受「自由行」影響較大的一個行業是住宿及膳食服務，但其增加值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至四；另一個較受「自由行」影響的是批發及零售業，但其增加值也不過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左右。如果再考慮到這兩個行業的增加值中也有香港市民及其他訪港旅客的貢獻，就不難知道「自由行」對通脹的影響是不大的。

第三，香港旅遊發展局曾在二零零九年底進行過一項專題調查，以評估「自由行」計劃對香港經濟的整體影響。結果表明，把直接影響及之後的影

響全部考慮在內，「自由行」計劃在二零零九年為香港經濟帶來一百六十一億元的增值額，這一數額雖不算小，但只佔當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不足百分之一。

其實對本港經濟活動影響大的，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即CEPA，而「自由行」只是CEPA中很小的一個計劃。但由於「自由行」是港人幾乎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而CEPA中的許多其他項目只有相關行業或專業的人員才能接觸和體會到，不少人難免把CEPA與「自由行」混為一談，把CEPA的成效與問題全部或部分地歸於「自由行」。因此「自由行的作用是被人們有意或無意間大大地「放大」了，其對本港經濟活動包括物價水平的真正影響，遠沒人們想像中那麼大。

在質和量上加以控制

實事求是地說，內地居民「自由行」為香港帶來了一定的商業利益，特別是在推出初期可以說是「救活」了飽受「沙士」摧殘的本港百貨零售業和酒店餐飲業。但「自由行」畢竟只是一個入境旅遊計劃，不可能也不應該對服務門類齊全、特別是現代及專業服務業發達的香港經濟產生太大的影響，自然也不會對本港的物價上升或通貨膨脹有太大的推動作用。

經過近十年來的實施，「自由行」目前真正的問題是，內地大批訪港人潮無日無之，本港很多旅遊景點和熱門商業區的承受能力都已經飽和，甚至是嚴重飽和，對香港市民的正常生活乃至香港良好的環境及形象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對此，正如梁振英特首所指出的那樣，是可以通過適當控制內地訪港遊客的「質」和「量」來大體上解決的。香港不可能、也不應該像某些人所鼓吹的那樣閉關鎖港、切斷與內地的經貿關係的。

作者為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副教授，博士

「永續論壇」豈能不談統獨？

□林修祺

兩岸互動



曾任馬政府首任「閣揆」、現任中華文化總會會長的劉兆玄，上個月在聯合報「名人堂」欄目，發表《時間換空間——設兩岸永續發展論壇》一文，倡議設立「兩岸永續發展論壇」（簡稱「發展論壇」），主張邀請各黨派及民間人士，與對岸有識之士共商未來的願景。議題範圍包括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社會正義、人文關懷、政治制度與政治改革。此機制，由民間先開始，每年設定議題，撇開現實的「統獨」，談未來兩岸的發展，雙方共同討論，為未來的兩岸找到改進的作法，規劃出進步的、創意的、合理的、可持續的願景。劉兆玄說，這個機制由民間推動，但又必須有兩岸政府充分的信任及重視，才能有相對的影響力。

卸任「閣揆」倡設高端論壇

劉兆玄特別向記者說明，這個構想已經與馬英九交換意見，意思就是已獲得馬英九的贊同和支持。劉兆玄是學者出身，又是馬政府的卸任「閣揆」及馬英九的親信人物，由他倡議和帶頭推動設立一個兩岸交流高端論壇，無疑具有相當的優勢條件和積極意義。若然這個高端平台舉辦順利，成效卓著，還可升格為對兩岸政府間具有重要溝通功能和建議影響力的「二軌」管道，為兩岸的談判協商創造條件並做準備工程。

然而，從劉兆玄所透露的內容來看，其規劃的「發展論壇」，有兩個問題值得商榷。

第一個問題，是「發展論壇」的議題涵蓋兩岸

關係四個主要組成部分，包括經濟、文化、社會、政治四大領域，格局似乎頗大，卻沒有突出的主題，相比於現有的不同範疇的論壇和交流平台，沒有顯著的特色和獨有的功能。

論壇涵蓋面太廣，在實際運作上難以面面兼顧，如果勉強兼顧，均分時間精力，則對不同領域的議題無法集中精力深入探討。

國共兩黨建立的交流平台，即「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辦得很成功，但經過八年來的運作，亦覺得經貿與文化的議題很難兼顧，最終只能把主力放在經貿方面進行系統性的深入研討，「文化」只能從屬「經貿」成為陪襯。因此，馬政府的「文化部長」龍應台，在去年5月提出文化論壇單列的設想，倡議另建「兩岸文化前瞻論壇」。

資源雄厚的國共論壇，只涉及經貿與文化兩個範疇，尚且無法兼顧的局限性，何況「發展論壇」涵蓋經濟、文化、社會、政治議題，肯定更無法兼顧兼得。因此，筆者建議，「發展論壇」宜專注於探討兩岸政治關係的議題。兩岸關係已由開創階段進入鞏固深化的階段；隨着兩岸關係走完「淺水區」進入「深水區」，政治關係的發展明顯滯後，政經關係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顯，若不及時正視和處理這個問題，勢必成為兩岸關係永續和平發展的隱患。若「發展論壇」定位為政治論壇和對話平台，將具有別開生面的特色和前瞻意義。

不能迴避「現況」空談未來

第二個問題，就是劉兆玄認為，在「現況」下談兩岸，必不能免於「統獨對立」的局面，而能談的都已差不多說完了，進一步的議題牽涉到敏感的定位問題，恐難免尖銳對立。解決之道，唯有把焦點放在未來，拉開時間距離，以長遠的眼光，超越兩種的思維，尋找理性處理的空間。這番話等於說，在「現況」下，即統前一前，兩岸政治關係定位

問題不能碰，唯有超越「統獨兩極」談沒有方向、目標的「未來願景」。

世上哪有脫離「現況」、不知方向、目標是什麼的「未來願景」？以台灣當局在1991年3月14日通過的《國統綱領》為例（此綱領雖被扁政府「終」結，但美國認為仍然存在），其所揭示的目標、原則都十分明確，無論是近、中、遠程階段，方向都沒有改變，這是一個連貫的發展過程。參照此綱領的階段劃分內容，兩岸關係已進入「中程——互信合作階段」，即「政經並舉」階段，難道可以脫離「現況」空談遠程階段、異想不是統合目標的未來願景嗎？

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呼籲：「探討國家尚未統一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這就是「現況」下無法迴避的政治議題，關乎兩岸關係的性質和政治定位，關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路線和方向。如果對這個擺在眼前的癥結性問題不談不談，試問如何談未來發展？談怎樣的未來願景？難道「不獨、不統、不武」就是「永續發展」的未來願景嗎？

「以拖待變」只能苟延偏安

劉兆玄已表明，他倡設「兩岸永續發展論壇」的出發點，就是「以時間換取空間」。這是台灣當局「以拖待變」的兩岸戰略思維，策略上就是盡可能拖延政治談判，拖延政治談判的方法，就是「台灣朝野政黨沒有共識」。謂予不信，就搭建一個民間論壇，讓各黨派及民間人士海闊天空、任意發揮，百無禁忌、爭論不休，藉此證明「台灣民意無共識、政治談判條件不成熟」。這種「時間換空間、以拖待變」的戰略和策略，充其量只能苟延「偏安」。從兩岸發展大趨勢來看，時間不在台灣方面，越拖下去，變的就是談判籌碼越少。此中利害得失，豈可不察。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

非洲依然是中國「精神近鄰」

中外連線

最近，媒體頻傳習近平總書記將在今年3月開始他履新後的首度出國訪問。除了訪問俄羅斯，目標之一就是非洲。相信這一信息會令國人及非洲大陸的朋友們感到高興，也會讓許多揣測中國外交動向的西方人士議論多多。

說到如何評價中國的對非關係，筆者對許多境外媒體的朋友早就說過這樣一句話，即「非洲雖遠，但卻是新中國的精神近鄰」。習近平將訪非這則信息是否可以印證此話，我不便妄議。但他的訪問若能成行至少可以使境外媒體，特別是西方傳媒明白，中國與非洲的傳統友誼和戰略互惠關係確實非同尋常！



秦曉鷹

習首訪行程包括非洲

說來有趣，我在聽到這一消息時，腦子裡閃動的卻是若干年前在肯尼亞港口城市蒙巴薩遇到的一件小事。那天，我忙裡偷閒想去看這個城市的博物館。因為路不熟，誤走誤撞地走進了一條比較僻靜的小巷子。一看沿街老舊的房子就能判斷出，住在這裡的人家大都不富裕，或者說都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吧。當我告訴那些好奇地圍上來的老人和婦女自己是中國人時，他們最初都不置可否地直搖頭。此時，我忽然靈機一動，說是「從鄭和家鄉來的」。此話一出，四周立刻響起了一片「鄭和?! 江胞（音譯，斯瓦希里語中的「朋友」「歡迎」之意）！江胞！」的歡呼聲。

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實在是太深了。我回國後把此事講給親朋好友，他們幾乎都不相信。是啊，中國明代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到過的非洲東海岸，至今還會記得他老人家的名字，聽上去的確有點不可思議，但這是真的，千真萬確。不僅如此，我有幸接觸過的幾位中國前駐非洲國家的老外交官們也曾說過，十幾年前，你對非洲底層民眾說「China」他們可能不甚了了，但你如果說「周恩來」，卻幾乎沒有人不對你報以友好和親熱的回應。上世紀六十年代，周恩來總理對非洲多國的成功訪問早已成為非洲公眾永不磨滅的友誼記憶……

筆者記述這些往事，無非是要說明，習近平即將成行的對非訪問，既具有歷史意義又具有現實意義，既有象徵意義又有實際意義，既是為了友誼的傳承又是為了拓展新型的戰略互惠關係。事實上，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已經經歷了幾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也現出不同的時代特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非洲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逐步走向高潮；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則出現了政治上的「井噴」，西方國家把這一現象稱為「獨立運動的雪崩」。新中國對有着與自己相似命運的非洲人民的勝利感到歡欣鼓舞。在此之後，取得獨立的非洲各國走上了謀求發展的道路。以援建坦贊鐵路為鮮明標誌的中非政治關係也由此增加了經貿內容。當然，這個時期非洲對中國的最有力支持則是幫助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與非洲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也更加務實。鄧小平確立的互惠互利基本原則，改變了以往政治經濟相互脫節的狀況。而隨着冷戰的結束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中非經貿關係更有了長足的發展。在中國經濟「走出去」的方針與「促進和諧世界」的戰略思想指導下，中非經貿往來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車道。首屆中非論壇在北京的成功舉行，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級別最高、來賓最多、影響最廣的一次國家級外交戰略行動。而非論壇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之一，則是中非雙方的進出口貿易額已基本上達到了平衡。這一平衡有力地說明中非雙方在經濟領域的互惠，以及相互之間的經濟依存度的大大增加。

消除陰影推進傳統友誼

交往多了，矛盾也自然會多起來。無可諱言，由於種種原因，中國與非洲在不斷擴大和深入交往中，也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快的摩擦和糾紛。其中較多的為商務和勞資糾紛。一些到非洲投資的中國企業家，由於不熟悉非洲社會的歷史進程、文化背景、人文風俗、民族特點、職業習慣，常常在企業管理上與當地公眾之間出現不該發生的誤會。個別缺少職業道德和操守的中國廠商，在商品交易中以次充好，不講誠信的行爲，也給傳統的好中非關係蒙上了陰影。所有這些，加上某些媒體的歪曲報道和炒作，也讓「中國威脅論」和所謂中國搞「新殖民主義」的謬論在非洲找到了一定市場。

儘管瑕不掩瑜，深厚牢固的中非友誼也不會因此而出現動搖。但筆者依然認為，在中國國內有必要對廣大公眾特別是企業界人士進行一次關於中非友誼的針對性教育。也有必要在中小學教育中增加中非友好往來的歷史內容。希望通過習近平在今年春天對非洲的訪問，能把這種公眾教育活動推向新的高度，為中國與非洲的傳統友誼帶來最為和煦的春風，留下一篇濃墨重彩的華章！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